

南昌起义前周恩来这样做情报工作

大都亲自谈话，作具体指导

作为中国共产党独立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起点，南昌起义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发动和进行，与起义领导者尤其是周恩来对情报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周密部署是分不开的。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作为中国共产党独立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起点，南昌起义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发动和进行，与起义领导者尤其是周恩来对情报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周密部署是分不开的。在以周恩来为前委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南昌起义从酝酿到各项准备工作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展开的，这样既有利于保卫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又有利于起义的顺利发动。

以身作则，严守保密纪律

开展军事行动，领导者必须高度重视情报保密工作。作为党的隐蔽战线的主要创始人和杰出领导者，周恩来深知严守机密的重要性。为保障起义的顺利进行，他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严格遵守保密纪律。

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组织武装起义对国民党予以反击。7月24日，周恩来、张国焘、加伦等在武汉举行会议，周恩来提议中央尽快决定南昌起义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并希望共产国际能够经由汕头给予军火和物资的接济。会议通过了上述提议，并规定了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

这次起义是极端机密的，严格遵守纪律，已是周恩来的习惯。临行前，他对邓颖超同样守口如瓶。邓颖超后来回忆说，周恩来直到“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悉心筹备，收集敌军情报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起义要想成功，领导者事先得认真研究敌情，派得力人手到南昌搜集情报，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当时，在武汉的朱德因熟悉南昌情况，具有深厚的人脉关系，因此，周恩来决定派朱德到南昌收集情报。

朱德到达南昌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利用滇军中老部下和老关系的掩护，详细了解了敌情，并精心绘制出一张详细的南昌市敌军布防图，国民党军驻地的碉堡、火力点以及进攻路线都标得清清楚楚。同时，他与驻守在南昌的国民党军的几个团长频繁接触，随时掌握敌情，成功掩护了一批起义领导人抵

达南昌。7月27日，周恩来经九江秘密抵达南昌。朱德详细汇报了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及驻防情况，并把南昌市街道图和亲自编绘的敌军兵力分布图呈送周恩来。周恩来看后很满意，称赞朱德为党做了一件大好事。

从起义军后来的作战情况可以看出，贺龙在指挥20军攻打驻藩台衙门的第5路军总指挥部时，就是按照朱德画的敌军兵力分布图打的。而叶挺部的驻地，基本上就是起义时部队根据地图部署的位置。把部队驻地安排与战斗部署结合起来考虑，既有利于防止在南昌城内频繁调动兵力引起敌军警惕，又有利于严密监控敌军，为后来起义的

睡下不久，上边就来了通知，我们一个个耳传着：“喂，注意！今晚恐怕有事，睡醒些！”睡梦中被叫醒，奉命紧急集合。队长宣布进入战斗。”而没有作战任务的非军事人员，大都是在战斗打响之后才得知起义的消息。

8月1日凌晨两点，起义各部按预先侦察好的方向和目标，对没有准备的敌军采取突然袭击，敌人惊慌失措，迅速瓦解。这次行动能够顺利进行，与事先做好的保密工作息息相关。

南下险途，布置密件传送

情报工作是一门高度科学的斗争艺术，周恩来一贯注重调查研



油画《南昌起义》

突然发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严守程序，确保机密安全

军事情报是保密内容，它的传播和使用必须先后有序、内外有别。周恩来政治保密意识很强，在南昌起义的情报保密上，特别注重从源头上严格控制情报的知晓范围，确保军事秘密的安全。

为保证起义的秘密性，周恩来进行了周密细致的部署，即便在临近战斗的前几天，各部仍保持高度警戒。7月30日下午，叶挺在百花洲畔的第24师司令部所在地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为了保密，会场周围有卫兵站岗警戒，闲人一概不许入内。与此同时，贺龙在江西省圣公会的宏道中学内也召开了团以上军官会议。为防止机密泄露，会议在宣布起义计划和作战任务后，决定加强战前检查工作，并把一些不可靠的下级军官换成共产党员。有关起义的命令是逐级下达的，过程非常严密，直到战斗即将打响的前一刻，连长才将命令传达给排长，排长传达给班长，班长最后传达给战士。第20军教导团战士涂国林后来回忆说：“起义前一天才突然接到命令，要我们移驻小营盘。当晚

究，善于识别、用好人才。起义发动后，他对委派担负情报任务的同志，大都亲自谈话，作具体指导。

9月上旬，南昌起义部队进入福建汀州城后，周恩来马上向党中央写了一封密信，说明了下一步行动的目的，然而如何送去却是个大难题。通过打听，周恩来得知有个叫陈居玺的人，便专程来到其住所，郑重地说：“现在让你去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送一个密件到上海给党中央……”接着，他又以素有的细致作风，仔细交代如何躲过检查，如何接头等事项。他交给陈居玺的这封信，还是用药水写在草纸上的，不用火烤便看不出来。后来，陈居玺果然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光荣而重要的任务。

南昌起义在党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南昌起义确实如平地一声春雷，使千百万革命人民在经历了一连串的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燃起了新的希望。作为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来源：光明日报

古代官场的“哭”耐人寻味

中国古代官场上，有不少关于“哭”的轶事。

《古夫于亭杂录》中这样的记载：董诰由御史大夫改任江西总督，一个同事向他辞别时，“甫就座，大哭不已”，董诰非常感动，安慰对方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那个同事马上擦去眼泪，走到另一个房间，遇到同僚却哈哈大笑，对方不解地问他为何如此，这位先哭后笑的官僚居然回答：“拔去眼中钉也。”原来他的哭，是喜极而泣也。

唐朝有个叫唐衢的人以“善哭”成名。他是一个落榜进士，他的哭声每使“闻之者莫不凄然泣下”。白居易留有诗句这样描述过，“贾谊哭时事，阮籍哭路岐，唐生今亦哭，异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饥。不悲口无食，不悲身无衣。所悲忠与义，悲甚则哭之。太尉击贼日，尚书叱盗时，大夫死凶寇，谏议谪蛮夷。每见如此事，声发涕辄随。”如此看来，唐衢的哭并不是多愁善感，而是对于政事的激愤。因此，唐衢的这种尽情地发泄，激起了白居易的共鸣。白居易还曾赋诗云：“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辞。”一时传为佳话。

唐朝的大诗人韩愈也是爱哭的。方勺在《泊宅编》中有过这样的统计，“韩退之多悲，诗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据说，韩愈有一次和朋友登华山，因“攀缘极峻，而不能下”，上去了却下不来，韩愈于是便“发狂恸哭”。而且在给张彻的信中，韩愈也谈到了这次“哭泣”：“洛邑得休告，华山穷绝径。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悔狂已昨指，垂诚仍镌铭。”

《巢林笔谈》中，记有张景州的一首《长歌行》：“君不见华山绝径退之哭，高处须防一失足。”他这样阐释韩退之的哭：提醒身居高位者，那些想做或做了坏事的人，如果不及觉醒收手，将来真心忏悔、哭泣也来不及了！

来源：北京日报